

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sup>①</sup>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中欧关系。过去四十多年来,中欧关系总体保持了高水平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这首先得益于双方聚焦于经贸、科技、金融等务实合作,中欧关系保持了稳定、务实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重视发展与欧洲的关系,不仅因为欧盟业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同时还因为作为两大和平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中国和欧洲肩负着塑造和引导世界的重要责任。目前,国际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的集团对抗的迹象。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走向对抗,让世界有可能重新回到对抗的时代。而世界重新陷入分裂和对抗,回到三十多年前的冷战时代,不符合中国和欧洲的根本利益。中国反对在世界上形成阵营式对抗。中国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要改变、颠覆现行国际体系。相反,中国支持和捍卫联合国体系,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原则应该得到所有国家的遵守。2022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表示:“8年前,我提出中国愿同欧洲一道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方的这一愿景至今未改变,当前形势下更有现实意义”。<sup>②</sup>未来几年,对于世界格局尤其是大国关系来说极为关键。中欧加强交流与合作既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 百年变局下的欧洲之变与中欧关系的起承转合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

---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61页。

<sup>②</sup> 《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04/01/content\\_5683038.htm](http://www.gov.cn/xinwen/2022-04/01/content_5683038.htm)。

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sup>①</sup>变局中的欧洲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其格局观、秩序观和发展观已发生深刻变化,其自我认知、政策目标和实施路径正加速调整,正处于从“后里斯本时期”向“后乌克兰危机时期”转型的关键节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欧关系的起承转合不仅是影响欧洲转型方向的重要变量,也将是塑造未来全球格局和地区秩序的主要因素。尽管对变局的认知结论和应对路径不同,中欧仍需相与为谋,共同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 一 百年变局下的欧洲之变:从“后里斯本时期”到“后乌克兰危机时期”

“欧洲转型”研究是此前学界对欧洲重大变化进行考察的主要范式,这一概念具有来自不同学科维度、不同分析视角的特定含义。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变化在历史学视野中是不折不扣的“欧洲转型”,而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冷战结束对于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地区而言也是一场完整意义上的转型。约瑟夫·威勒(Joseph Weiler)在1991年提出的“欧洲转型”框架则是从一体化转型的视角出发,运用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对欧洲共同体从经济向政治转型做出的阶段性观察和总结。<sup>②</sup>尽管威勒等人的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并在其后做了回顾和更新,但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它在国际视野和对时代认知上的局限性愈发突出,更像是“历史终结论”的欧洲版本。<sup>③</sup>

从背景、动因和方向上看,当前的欧洲之变不仅大大超越了威勒等人的一体化范式,也不局限于近年来成为热点的欧洲经济、能源、数字和地缘政治转型等领域,而是在格局认知及自我定位、发展方向与政经结构、政策逻辑与行为方式上正发生“具有‘质变’性质的重大转变”,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相互交织。因此,对当前欧洲之变的考察既与此前的欧洲转型研究密切相关,又需要赋予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丰富的时代内涵。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页。

<sup>②</sup> Joseph Weil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100, No.8,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Law, June 1991;转引自“欧洲转型与世界格局”课题组:《欧洲转型:趋势、危机与调整》,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1期。

<sup>③</sup> Miguel Poiars Maduro,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Twenty-Five Years On,”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Marlene Wind,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17.

### (一) 欧洲的格局观之变：“去西方化”与多极世界

欧洲对当今世界格局的认识是基于近十年来内外矛盾不断上升、自身应对能力不断下降的经验而逐渐形成的。从2015年至今的历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报告的关注点可以看出,不安全感的加剧和对变化方向的迷茫是影响欧洲世界观变化的两条主线。从“崩溃的秩序”到“无尽的危机”,从“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碎片化到“去西方化”的“无助感”,欧洲政策界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方向进行了反复追问,对于“自由—民主秩序礼崩乐坏”的危机感逐年增强,并将危机归咎于“不情愿的守护者”和“鲁莽的破坏者”,但仍试图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建立某种平衡。<sup>①</sup>但2022年年初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粉碎了欧洲对危局“从边缘回归”的期待和西方还能“力挽狂澜”的幻象。<sup>②</sup>在大国竞争失控的风险急剧上升、欧洲沦为博弈主战场的形势下,尽管很不情愿,欧洲政策界主流也承认,“中美竞争主轴下的多极格局”是最为贴近现实的未来场景。因此,确保自身能跻身于大国竞争之列并成为其中的稳固一极成为欧洲最理想的前景,维护“自由—民主秩序”则成为欧洲在应对变局中基本的政治定位。<sup>③</sup>

### (二) 欧洲的秩序观之变:基于规则还是基于实力?

在欧洲看来,“自由—民主秩序”受到的最直接和最重大挑战是基于“普世价值”的普适规则正遭受巨大冲击,这既包括来自内部的“非自由民主”和民粹主义的政治挑战,也包括“专制国家”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制度性挑战。自冷战结束以来,作为西方阵营的核心成员,欧洲坐享地区和平及经济全球化的红利,通过欧盟扩大和形形色色的“伙伴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规则输出,欧洲的政治制度、法律规则和生活方

<sup>①</sup> 参见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报告,“The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5: Collapsing Order, Reluctant Guardians?”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15>;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6: Boundless Crises, Reckless Spoilers, Helpless Guardians,”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16>;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7: Post-Truth, Post-West, Post-Order?”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17>;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9: The Great Puzzle: 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19>;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 Westlessness,”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0>;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1: Between States of Matter—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1>;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2: Turning the Tide—Unlearning Helplessness,”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2>。

<sup>②</sup> 参见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报告,“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8: To the Brink—and Back?”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18>;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2: Turning the Tide—Unlearning Helplessness”。

<sup>③</sup> 有关表述参见博雷利就中美竞争及多极化发表的观点,“Josep Borrell Outlines The EU’s Priorities in a Multipolar World,” February 25,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josep-borrell-outlines-the-eus-priorities-in-a-multipolar-world/>,以及德国总理朔尔茨有关多极化的表述,“The Global Zeitenwende: 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3, <https://www.eurasia.ro/2022/12/07/the-global-zeitenwende>。

式的吸引力共同构成软实力,成为其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大国博弈转向全方位竞争尤其是硬实力成为重要指标时,欧洲在国内政治、欧洲一体化和对外关系层面出现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内卷”,如制度合法性和吸引力下降、“多速欧洲”可能异化为“多向欧洲”以及规制输出遭遇推回(push-back),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面前处处碰壁并可能沦为“超级大国的玩物”。基于上述残酷现实,欧洲认为至少在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基于实力来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游戏规则。欧洲必须对基于规则的愿景“不再天真”,必须接受现实主义的实力逻辑来改造自己并确保能在大国博弈的第一集团中站稳脚跟。唯其如此,欧洲才能在新秩序中继续拥有话语权、影响力和随之而来的规则制定权,这成为欧洲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秩序观。为提升能力来适应变化、弥补其过于依赖规则的观念和政策缺陷,欧洲转向通过“战略自主”来提升硬实力并重整内外资源、重塑实力构成。但能力建设需要长期、集中的政治意愿、政策支撑和资源投入,在当前力有未逮之际,欧洲仍希望利用多边主义来规范多极世界,在基于实力与基于规则之间保持平衡,通过“硬化”并“强推”规则来弥补短期内实力不足的短板并为长期的实力建设争取时间。

### (三) 欧洲的发展观之变:从经济扩张到政治/安全保护

欧元区债务危机是欧洲经历的一系列内外挑战的起点,也是激发欧洲的观念、政策和行为之变的开端,发展观的转变是欧洲最为深远和持久的变化。在强调“欧洲主权”并倡导“战略自主”之前,欧洲的发展观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秩序扩张掩盖下的地缘经济扩张,无论是欧盟东扩还是四面出击的自贸区战略,都服从于扩大单一市场并对外输出经贸规则的经济目标。需要注意的是,欧盟作为“地缘经济力量”的性质是单一市场不断扩大在国际关系层面的必然体现,只不过在此前的全球化扩张阶段,欧盟利用全球化浪潮将自身的经济规则 and 标准提升并加以推广,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其作为规则的普适性而淡化了其作为力量的地缘性。但在全球化进入低潮,尤其是在欧洲遭遇连番危机、经济竞争力下降、中国等经济体在自身国情基础上合理利用全球化规则获得成功后,欧盟作为地缘经济力量的特征与“普适规则”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并难以掩盖。在此背景下,欧盟从提出并泛化“欧洲主权”观念到突出经济安全并将“战略自主”延伸到经济领域,再到提出绿色与数字两大转型方向并最终打出“地缘政治转型”旗号,就是以改变在其中正逐渐失去规则主导权的国际经济环境为目标,并为进一步整合单一市场,深化经贸联盟,建设技术、产业、能源和财政联盟等提供政治合法性。至此,欧洲的发展观已经从此前借自由主义全球化规则进行地缘经济扩

张,转向以多极格局下地缘政治博弈为主导的政治/安全保护+地缘经济竞争的逻辑。

#### (四)“后乌克兰危机时期”:欧洲转型新阶段

上述有关“欧洲之变”分析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从威勒等人的观点出发,可以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里斯本条约》看作欧洲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即欧洲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开始向政治一体化发展,并在经历“欧洲宪法”失败后以《里斯本条约》的缔结和生效作为阶段性成果。然而,还未消化完政治一体化的成果,欧洲就陷入接二连三的危机之中,制度建设和促进社会共识的长期任务让位于不间断的危机应对策略,直至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欧洲转型实质上正从2009年至今的“后里斯本时期”进入“后乌克兰危机时期”。

“后乌克兰危机时期”的欧洲转型已经很难运用单一的一体化框架来进行解释和分析,从《里斯本条约》签署至今,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欧盟的地缘政治转向,都超出了此前的经验范围和分析框架。在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下,欧洲从自在自为的转型建设轨道转向危机倒逼下的刺激—反应模式,这是它与此前欧洲转型阶段的主要区别。此外,欧洲受大国竞争因素、格局转换和秩序变动的更大影响,政策反应也更为灵敏,这也是当前欧洲转型有别于此前阶段的主要特征。

## 二 中欧关系成为影响欧洲变局的重要变量

乌克兰危机成为欧洲转型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尽管危机仍在持续且结局难以逆料,但欧洲将处于较长时期的安全架构重建、能源经济重组以及内部权力调整状态,这是贯穿整个“后乌克兰危机”时期的主题。大国关系和格局变化对欧洲转型的影响和塑造作用将继续增强,欧俄在对立中共处、欧美在协调中竞争的趋势较为清晰,中欧关系则更为复杂,不仅易于受到其他大国关系的影响,并且在欧洲对华合作、竞争与抗衡(对手)并存的政策逻辑下波动性更强。从大国关系的影响来看,欧洲转型的方向和方式将取决于其如何处理三对基本矛盾,中欧关系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甚至关键的角色。

#### (一)世界多极化与价值观两极化之间的矛盾

世界多极化正成为在欧洲政策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的格局观,建设“战略自主”、保持欧洲特性以及拓展经济利益等政策目标都将建立在这一基本判断上。但与此同时,出于保持欧洲政治特性和强化规则输出能力的考虑,欧洲又热衷于在处理国

际关系时更加突出价值观维度,并在美国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民主与非民主(专制)对抗”的二元价值观。从“有原则的实用主义”出发,欧洲对世界多极化的认识服务于其实用主义的一面,二元价值观则对应其要坚持的政治原则。尽管这种既多极又二元的逻辑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弹性空间,但在实践中却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为应对变局,欧洲需要通过强调价值观来明确政治身份、实现政治动员,并通过严明政治规则来解决内部的“非自由民主”问题,同时还要利用“共同价值观”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变化并在中等发达国家中拉拢政治盟友、实现利益扩张。但在处理与非西方国家关系时,欧洲对单一价值观的坚持与世界多极化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价值观外交的作用下降甚至还会产生副作用和反作用。欧洲在多极世界中的利益扩张非但难以得到价值观的加持,反而遭遇不同形式的反对。近年来,中欧之间政治分歧上升的症结,就在于欧洲坚持并扩张自身价值观与中方关于发展道路多样性愿景之间产生了深刻矛盾:欧方试图以单一价值观来消除内部政治分歧并驾驭世界力量多极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变化方向;中方则以文明和发展道路多样性来认识和强化自身力量上升的合理性,并以此回应世界多极化的现实和趋势。双方在格局观和秩序观上的分歧与现实中相互力量对比的变化相联系,在中欧之间达到新的力量平衡之前,这种矛盾将难以调和。

## (二)经济共生与政治对立之间的矛盾

与多极格局现实和二元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相对应的是,欧洲在同时扮演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角色时难免出现认知分裂、利益分歧和政策扭曲。在既有的地缘经济格局中要实现以价值观为先导、以硬实力增长为目标的地缘政治转型,欧洲就不得不面对并处理两种不同政策逻辑之间的矛盾,否则非但不能利用其经济资源为地缘政治转型提供足够支撑,反而可能由于对现有经济格局造成破坏而失去其地缘经济利益。

“欧洲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输家”是近年来欧洲民粹主义进行政治动员时的主要说辞,也成为欧洲为地缘政治转型进行辩护的官方说辞。通过地缘政治手段来重新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经济格局和利益分配模式,成为欧洲的主要政策动机,也是其为解决政治转型目标与现有经济利益之间矛盾提供的主要逻辑。但在现实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是,欧洲曾经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实现了既有条件下最优化的资源配置,正是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和对中国的“市场依赖”支撑起现有的地缘经济格局和外向型的盈利模式,帮助其推广了经济理念和市场模式,并在欧洲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强大的共生关系。如果任由地缘政治逻辑来推动政治对立并主导经济政策,欧洲既

有的地缘经济格局将发生结构性的巨大变化。尽管欧洲提出以多元化布局来应对政治转型对经济产生的压力,但无论是向内挖掘一体化的经济潜力、能源供应转向北美、中东和北非,还是在东南亚地区重新进行产业布局,其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可能付出的巨大成本都是现有的成本—收益计算方式所难以接受的。当前欧洲政界与经济界围绕“摆脱依赖”出现的巨大分歧和争论就是转型期政治对立形态与经济共生关系之间的强烈碰撞。相比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刺激下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现实,中欧经贸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一旦出现巨大改变,成本也将更加高昂。因此,中欧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将是对欧洲基于地缘政治转型的新发展观能否落地并最终服务于其政策目标的试金石。

### (三) 作为政策路径的合作与竞争之间的矛盾

基于格局观和秩序观的变化,欧洲意识到需要面对一个更复杂的对外政策环境,即在以地缘政治博弈为主题的世界格局中,要同时应对单一价值观与格局多元化、政治对立与经济共生之间的矛盾,需要在政策路径上实现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并且其理想状态是根据不同时期和具体领域来实现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大国关系的动态平衡。这种实现并维持平衡的努力集中体现在欧洲对美国既协调又博弈、对俄罗斯既反对又留有余地以及对中既合作又竞争还要抗衡的政策实践中。

但在当前各国都以内政优先作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形势下,欧洲想要实现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动态平衡变得异常艰难。乌克兰危机从克里米亚冲突演变为俄乌冲突,一定程度上是欧洲对俄接触加防范平衡政策失败的产物;围绕《通胀削减法案》的博弈则体现出即便是拜登政府也不愿意受制于能够体现欧盟集体力量优势的谈判方式。欧洲试图在中欧关系中建立起按领域划分的不同政策逻辑并保持平衡,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由于其逻辑之间的矛盾性和内部的权力分化而产生失衡的结果。其中最显著的案例是,出于欧方推进地缘经济扩张目的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应当按照其“基于谈判实现合作”的政策预期来进行管理,但在实践中却遭遇来自欧洲议会有关中欧互为“制度性对手”的政治逻辑的强烈约束,并扩散为对中欧合作空间的进一步挤压。在合作与竞争的政策路径选择上掌握主动并维持理想的平衡状态,与现实环境中欧洲受到内外因素制约而难以掌握主动并实现平衡之间的巨大矛盾,将对欧洲能否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合理利用外交资源来实现其转型目标构成持续挑战。

### 三 欧洲变局与中欧关系的起承转合

中欧同处百年变局之下双方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新阶段,体现为格局观、秩序观和发展观发生巨大变化的欧洲变局将对中欧关系的现实基础和未来走向产生直接影响,双方关系的起承转合也将对欧洲变局的方向、目标和路径发挥重大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的前途所在。<sup>①</sup> 这些基本原则和政策目标应当成为在当前变局中处理好中欧关系的出发点。

#### (一)从构建良性大国关系的高度认识和应对欧洲变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sup>②</sup>其中和平共处是底线、总体稳定是条件、均衡发展是目标,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塑造大国关系格局指明了方向。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大国之间利益冲突、互信缺失、协调失灵、竞争升级、集团对抗态势加剧的趋势,实现上述目标的制约因素增大。中欧关系作为大国关系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承转合能否有序平稳有赖于大国关系的总体改善,但也可以通过其稳定和发展来为大国关系的良性化做出贡献。

在欧洲格局观、秩序观和发展观发生深刻转变之际,中欧之间仍需要通过坦诚对话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进一步破解权力转移、规则重塑和秩序重建等关键问题,为大国关系格局的良性化提供中欧共识。美国为其大国竞争确立的理论和政策基调是所谓的“权力政治+规则正义+秩序稳定”,即将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权和改良国际秩序的目标,歪曲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对国际规则和秩序稳定的破坏。欧洲未必接受美国的霸权政治逻辑,但对所谓规则正义和秩序稳定问题有切身担忧。我们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应建立起“反霸与多极化并进、规则应普适优化、秩序可稳中渐进”的话语逻辑,通过集中回应“权力竞争与博弈规则”“反霸与反美”“实力增长与势力范围”“内政与外部效应”“权力多极化与秩序规范”等诸多尖锐问题,在国际舆论中更多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60-63页。

<sup>②</sup> 同上文,第61页。



地树立建设性形象,在大国关系尤其是中欧关系中展现出更多的良性竞合的姿态。

## (二)处理好中欧关系从“同富”向“共强”的逻辑转变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和全球化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互补合作、共同发展”成为中欧关系的主题,追求共同利益、促进务实合作成为双方的政治共识及政策基础。在全球化遭遇地缘政治冲击、中欧实力对比加速变化的背景下,欧洲将“更强大”作为其显示地缘政治存在、进行地缘战略博弈的主要目标,与中国“强起来”的发展目标既有共同指向也存在对撞风险。欧洲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博弈来摆脱困境并维系对其有利的利益格局,导致中欧关系的逻辑发生变化,能否实现“公平竞争、共同强大”成为今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中欧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趋势下,欧洲担忧其国际竞争力优势难以持续并最终被挤出中国市场,是促使欧方在对华政策中转向地缘政治逻辑的首要因素。在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下,欧洲面临的福利财政拖累、产业转型升级瓶颈、技术的市场转化力弱、能源短缺以及基础设施老化等困境加剧,整合内部市场并进行区域外经济扩张的需求上升,对于中国能否保持市场开放、能否“遵守规则进行公平竞争”的疑虑和关切也全面上升。

将中国日益扩大的政治影响及话语权塑造成“政治和制度威胁”,以转移其内部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和民粹主义的矛盾,是欧洲提高价值观调门、渲染“制度竞争/对抗”的主要政治动机。欧美民粹主义上升使其主流政治深感“民主危机”,东西欧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路线之争也使其倍感“去西方化”的压力。将中国塑造成政治对手有利于欧方回避改革诉求、转移内部矛盾并打压波匈等“专制政府”,也服务于其进行“再西方化”的“意识形态圈地”目标。同时,出于对中国将经济政治资源高效率转化为军事实力并推行“排他性地区政策”的担忧,欧洲试图通过其“印太战略”和“全球门户计划”等在亚太地区搞战略扩张和横向联合,也进一步加大了周边形势的复杂性。

未来十年是中欧实现发展和安全可持续的关键时期,也是大国冲突加剧并可能对各自外部环境造成颠覆性影响的高风险期。从避免发展与安全风险同时出现并相互叠加的现实目标出发,中欧需要在切实推进改革、优化市场环境,持续释放市场开放红利等方面相向而行,强化经济共生关系并增进共同利益。中欧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公共卫生及冲突预防、危机管控等全球和区域治理的合作领域要坚持摆脱政治化、安全化的干扰,为大国关系实现良性互动提供合作样本。同时,针对欧洲的地缘政治转型动向及其面对的地缘冲突风险增大的现实,应当将推动中欧建立战略互信作为帮

助双方重建政治互信的基础和抓手。基于经贸合作的中欧政治互信遭遇欧方意识形态化的冲击,已难以适应地区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应当抓住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影响力显著上升的机遇,在维持原有利益基础上加强中欧在安全建构、危机管控、能源合作、人道主义等领域的沟通合作,以战略互信超越政治分歧,为中欧关系重建“经贸利益+安全共识”的政治互信基础。

### (三)实现中欧“合作共处”

为在中欧关系变局中赢得主动权,欧方提出对华“三重定位”、构建对华政策和法律攻防体系、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及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等行为,体现出其政策逻辑正从原有的合作博弈转向非合作博弈。与达成共识、遵守契约并增进共同利益的合作博弈不同,非合作博弈具有双方自主倾向强、契约基础弱以及合作与冲突共存等特点。目前中欧关系已整体呈现出非合作博弈迹象,并在经贸、人权以及安全等领域存在竞争甚至对抗博弈的风险。

尽管在变局之中的应对之道或有不同,但基于巨大的现实利益考虑、坚持多边主义的政治共识以及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中欧之间仍需相与为谋。为此,中欧之间应超越当前在相互认知和政策定位上的分歧,本着务实原则就相互关系以“合作共处”为基础达成新的共识。双方合作应重点在经贸、地区事务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展开;“共处”则对应政治、安全等冲突领域,在形成管控分歧的基本原则、有效机制和规则的基础上,探讨开展合作的可行性。这不仅可超越双方在合作与非合作之间的话语分歧,亦可体现中方对欧洲“追求强大”和“战略自主”的实际支持。

为实现合作共处的目标,中欧应当通过公开、透明的法律和政策途径来合理管控分歧,增强对彼此政策的可预期性,减少由于意外事件和误判对双方关系大局的冲击。在构建其地缘政治博弈的攻防体系过程中,欧洲体现出政策转化为法律的效率加快的特点。中国也应在加强政策前瞻性的基础上,通过将对外关系纳入法治化进程、增强政策透明度等方式,加强对欧洲的预防性外交手段。

为实现合作共处的目标,中方应加强对欧洲所关切地区和事务的建设性参与,将共同防范风险和管控危机纳入中欧共同利益框架,并不断探索将中欧关系中的竞争和抗衡因素转化为合作共识的解决方案。欧洲议会近期针对中欧关系前景进行的专家调研结果显示,未来十年中欧关系的优先领域首先是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其次是减少供应链依赖并保护知识产权,另外,基础设施及投资监管、南海问题、人权、网络安全、技术合作以及信息传播等领域的中欧互动也成为重点关注的话题。上述领域

既有欧方以合作为主导逻辑的如气候变化领域,也有强调竞争因素的网络和技术领域,更有合作与竞争逻辑并存如基础设施和投资领域(如欧方专家大多提出应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进行“重新谈判”)。<sup>①</sup>针对上述欧方关切,中欧应当在政策预期和实践上对表聚焦,在促进合作的同时有效抑制竞争因素并消除对抗色彩,将竞争与对抗因素朝向合作共识转化作为政治沟通和政策对接的重点。除具体领域外,中欧实现合作共处还有赖于双方在第三方实现经济、安全和社会领域的合作。通过始终遵循中欧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性,不断增强中欧关系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中欧就能不断克服变局中的种种不利因素和消极影响,实现合作共处的目标。

## 新时期中欧关系发展的新机遇

张 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全球发展已进入一个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日益上升的新的历史时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是大势所趋。但与此同时,一些势力逆流而动,大搞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危害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中欧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双方之间不存在战略性分歧和矛盾,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作为两大力量、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中欧关系发展在遭遇新挑战的同时也面临新的历史性机遇。

### 一 世界进入新时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持续加剧,逆

---

<sup>①</sup> “EU-China 2030: European Expert Consultation on Future Relations with China,”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EPRS), December 202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EPRS\\_STU\(2022\)739240](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EPRS_STU(2022)739240).